

SELECTED ESSAYS

文学论文集

符号学

赵毅衡
编选

...similarity to an existing model
...down to what extent tinkering
...rch for a meaning): a hypothesis
...possible to verify in any society.
...tization of the usages is crucial:
...that there is no reality except
...e, and should eventually lead to
...logy with socio-logic.²⁴ But once
...ted, society can very well re-
...speak about it as if it were an
...: a fur-coat will be described as
...protect from the cold. This re-
...ation, which needs in order to
...r language, is by no means the
...l indeed purely ideal) functional-
...ction which is re-presented does
...o a second (disguised) semantic
...which is of the order of connota-
...ion therefore has (probably) an
...e, since it is the very unit where
...technical and the significant are

THE SIGNIFIED

the signified: In linguistics, the
...ed has given rise to discussions
...chiefly on its degree of 'reality';
...n emphasizing the fact that the
...ng' but a mental representation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符号学

文学论文集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符号学文学论文集 / 赵毅衡 编选.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ISBN 7-5306-3807-6

I. 符... II. 赵... III. ①符号学 — 文集②文学理论 — 文集 IV. ①H0-53②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106146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房地产管理局印刷所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1.125 插页 2 字数 470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定价: 31.00 元

前言：符号学的一个世纪

一、符号学,作为学科,作为方法论

符号学应当说是一门学科,如语言学,文学或人类学一样。它研究人类社会(甚至非人类社会)使用符号的各种规律,或从使用符号的方式入手研究这个社会的文化、文学艺术或其他方面。作为一种学科的符号学,是一门有独立研究对象的,内容极其复杂,有其自身规律的课题。

但是如果我们把人类文化定义为符号表意及释义活动之集合,那么符号学也就成为一种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论。作为方法论的符号学,与结构主义方法论、后结构主义方法论等有许多重合之处,但是,严格地说,符号学的方法论色彩更为独特,而且其跨幅之大,超出了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

因此,最好把符号学看做是一门渗透入多种现代理论思潮之中的独立学科,这门学科又可以作为总体方法论,可以用来研究语言学、文学、艺术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等许多学科。它的可塑性强,因此可以有结构主义色彩的符号学,后结构主义色彩的符号学,以及与上两种思潮无重大牵连的符号学。而且,我们可以肯定,今后会有渗入其他潮流的符号学。

说清这一点,可以解释不少误会。尤其是现代符号学与结构主义几乎是共生的,而结构主义作为一个总体方法论曾经声势浩大,几乎囊括了所有的人文与社会学科。但即使在这种时候,我们想必也会记得,符号学的立足点,首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我们可以说结构主义大量使用了符号学方法和原理(下文有详细解释),但结构主义符号学只是符号学发展的一个阶段,

而且只是某个分支的一个阶段。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当结构主义退潮、后结构主义试图分解结构主义过于强烈的整体化倾向时,符号学不仅活着,而且成为“后结构主义转向”的主要突破口之一。

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符号学,将化解对任何试图对人类文化作总体式思维的方案。符号的复杂性,没有一个学派能够穷尽。

二、符号学的起源

符号学有两条主要发展线索。第一条线索与结构主义原本无关: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体系的创始人之一皮尔斯(C. S. Pierce, 1839—1914)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从逻辑角度对符号进行研究,一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实用主义哲学家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把这一派符号学体系化了。这一派符号学逻辑和技术倾向比较强,直接影响了在二次大战中开始形成的控制论和信息论。它很少作为一种“总体方法论”出现,与文学研究也没什么直接联系。三四十年代美国新批评派曾借用莫里斯一些研究成果,那是例外。但是近年来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和艾柯(Umberto Eco)等符号学文论家试图把皮尔斯和莫里斯的理论吸收到结构主义—符号学之中来;苏联符号学派,由于一直关注人工智能和机器翻译等技术问题,所以吸收皮尔斯和莫里斯的符号学较多。

为了不把问题复杂化,我们暂时把这一条符号学发展线索搁开。

符号学的另一个始祖是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他同时也是结构主义的始祖。他的传世之作只是一本薄薄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还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在他死后,一些同事从他的笔记和他的学生的课堂笔记中整理出来的。索绪尔如果知道他谦逊地提出的三两点看法会在现代世界发展成如许大规模的学派,肯定会吓一跳。

二十世纪关注符号学的哲学家还有多人。例如新托马斯主义者马里旦(Jacques Maritain),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Ernst Cassirer)和卡纳普(Rudolf Carnap),但他们所说的符号意义接近“象征”(symbol),或是接近逻辑符号,与当代结构主义—符号学发展主线没有直接联系。

索绪尔没有说过“结构主义”这个词,但他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包括语言学在内的新学科“符号学”(la semiologie)。二三十年代他的后继者,如布拉格学派,在索绪尔语言学的基础上发展出结构主义,因此,可以说,结构主义是从索绪尔对语言的符号学式研究中发展出来的。这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关系的第一阶段,二者尚未真正汇流。

当结构主义在五六十年代发展成一个规模庞大的方法论体系时,它也成为符号学研究的方法论,当然此时的符号学已经可以用来研究文学等科目,但依然是在结构主义的大旗之下。此时,不少论者认为结构主义与符号学是一物二名,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基本上我们可以称五六十年代的符号学为结构主义的符号学。这是两者关系的第二阶段。

到七八十年代,结构主义被突破、超越,欧美知识界主要思潮变成后结构主义,而符号学的发展是突破结构主义的最主要

途径(虽然不是惟一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结构主义的“总体方法论”地位。因此,不少人把后结构主义称做符号学。这是二者关系的第三阶段。

我们已经把问题简单化了一些,但依然纠缠。其原因是符号学本身很复杂,边界不清,虽然发展了近百年,却至今尚未能说完全成形,它还在蓬勃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潮,主要在东欧、中欧法语区、意大利和英美(主要是美国)流行,北欧和中欧德语区还是现象学文论占优势。这就是为什么本书没有选德国文论家的篇章,附录术语表也没有德语的一个原因。

结构主义的符号学可以说是自身突破成为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其基本概念还是一脉相承的。本书内容包括所有这三个阶段,斟酌再三,定名为《符号学文学论文集》。

三、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基本原理

系统

结构主义的中心观念其实不是“结构”(structure)而是“系统”(system)。结构是相对于零星散乱而言的,而系统是相对于孤立、片断(segmentation)而言的。结构观念自古有之,亚里士多德分析悲剧,分析出六个因素,再进一步分析这六个因素各自的功能,这是结构分析,但不是结构主义,因为其中并无系统关系。

系统分析则不然,它强调的是部分(或组分、因素)脱离了系统就不再具有意义,用信息论的说法就是:不能纳入系统的东

西,无法了解,不能贮存,也不能传送。结构主义的奠基者之一莱维-斯特劳斯特对结构主义有如下定义:

首先,结构展示了一个系统的特征,它由若干组分构成,任何一组分的变化都要引起其他成分变化;

第二,对于任一模式,都应有可能排列出由同类型一组模式中产生的一个转换系列;

第三,上述特征,使结构能预测,如果某一组分发生变化,模式将如何反应;

最后,模式的组成,使一切被观察到的事实都成为可以理解的。^①

这个四点定义,其第二点转换系列问题下文将谈到,其余三点谈的都是组分与系统的关系:组分的变化会引起系统“模式化”的变化;没有系统,则组分完全无意义,无法理解。

最简单的例子:交通灯有红、黄、绿三色,孤立地分析红灯为什么是停车信号毫无意义,红灯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处于这个信号系统之中,有黄绿二灯各自的意义做背景。整个系统使它获得意义。

读者可以参阅本文中穆卡洛夫斯基论“前推”,雅各布森论“主导”的论文,这是结构意识最早的自觉表现。论述比较简单,但很清楚:“前推”之所以存在,之所以起作用,只是因为它把其他成分“后推化”。而“主导”成分一旦发生变化,那么整个系统就如莱维-斯特劳斯特所说的,发生了“反应”,例如由浪漫主义文

① Claude Levi-Strauss, *L' 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 Paris, 1985, p. 280.

学变成了现实主义文学。

莱维-斯特劳斯没有能说明的是:系统的组分往往是有层次地组合,例如巴尔特把文本分成功能体(function)、情节(action)与叙述(narration)三个层次;热奈特把叙述分成内叙述、外叙述与元叙述等层次。巴尔特提出了一条原理,即必须超越一个层次才能理解该层次,在层次之内,我们只能看到组分的关系,而看不出意义。要理解语言,必须进入元语言层次;要解释初度和二度体系,必须进入三度体系;要理解任何符号过程,必须进入深层结构。体系本身无法提供解释自己的语言,必须在垂直方向运动才能理解水平延伸层次的“庐山真面目”。

符号

符号体系是最典型的体系。电报或计算机把最简单的符号组分(点与划,开与关)组成了表意量极大的系统。

符号的传统意义就是用一物意指另一物来完成传达任务,这是人类文明的一大特征,整个人类文明可以说是符号式传达的文明。在人的社会活动中,每一种实用物都会渐渐带上符号意义,以致最终完全失去了实用性,或者失去了最初的实用性的痕迹。宗教或其他仪式活动就是这类无实用功能的符号体系。

完全没有符号意义的实用物或实际活动是否存在?应当说是存在的,没有进入人的社会活动的物件不可能成为符号。皮尔斯说“宇宙渗透在符号里”,他是夸张失实了。在人类社会中,实用物或实际活动会很快带上符号意义,但大部分同时还保留一部分实用功能。筷子象征中国文化,但筷子还是可以用来做餐具的。开名牌车表示阔气,但名牌车性能的确不错。这样的符号称为符号—功能体(sign-function)。

但是,符号体系的威力在于它很快便能把实用功能完全消除,而且进一步用它自身的规范作用(modelling)为社会文化服务,使一个文化保持其凝聚力。各民族的习俗(包括衣服食物装饰)不仅是种族意识的反映,更是保持种族文化力量的排外性规范体系。清兵入关,“留发不留头”,发式这个符号比生命还重要;假洋鬼子的老婆因为丈夫辫子是假的,就“跳了三回井”。

符号的接受或排斥甚至可以引起生理和心理上非常切实的感觉。据民俗学者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研究,犹太人忌食海蜇,是因为犹太人为自存而禁止族外通婚,“非鱼非肉”的海蜇触了忌讳。民族文化意识极强的犹太人看到海蜇会翻胃,这种情况,可以称为符号引起的“现实幻觉”。

这个问题与文学艺术大有关系。文学艺术当然是符号活动,它们就利用这种“现实幻觉”来催人泪下,或“海淫海盗”。

四、语言学与符号学

因此,符号学就是研究各种类型化(非偶然的、个人的)传达方式(patterned communication)的理论。

符号学的创始人索绪尔是个语言学家,但是他认为语言学应当归入一个更大的学科——符号学中,在其中,语言学起一个基准模型(master pattern)的作用。意思是说,其他符号体系的研究,可以参照语言学来进行。

但是语言学在符号学中的地位实在太特殊。语言不但是人类社会最大的符号体系,而且大得不成比例,其他符号体系与之相比都实在太小,而且全都可以被语言混杂、解释、置换。

人类文化是一种语言文明,现代文明更是一种书面语文明。大部分规模较大的符号体系,是建筑在语言这初始体系之上的二度体系,例如文学、艺术、宗教、神话等等。巴尔特甚至提议应当把符号学看做语言学的一部分,即“大表意单位语言学”,但这恐怕无助于弄清问题。

符号本身由两部分组成,即能指(signifiant)与所指(signifié),索绪尔在确定这两个术语之前,曾在“形式/意会”、“形象/概念”等术语上犹豫。这大致说明了“能指/所指”是什么意思。符号就像一枚铜板,有着两面,但是我们经常把“符号”这个词作为“能指”的意义来使用,因为能指是符号中“显现”的部分。

照理说,能指是替代物,所指才是真义所在:红灯是“形式”,红灯所意指的“不准通行”是不容反驳的实在。但符号这东西就是怪,大部分情况下能指比所指重要。中国人用叩头向皇帝表示敬意,西欧人用鞠躬,能指不同,所指相同。但是欧洲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苦心经营近二百年,最后却自动撤出,原因是罗马天主教皇虽然也同意教士们应向中国皇帝表示敬意,却不允许他们向中国皇帝叩头。

任意性

能指与所指是如何搭上关系的呢?也就是说,为什么一个特定能指与一个特定所指有关,而不指向别的所指呢?

按皮尔斯的说法,这二者(也称为“符号”与“客体”)关系有三种可能。一是标示(index),例如病症指示疾病,沙漠绿洲标示水源,二者有因果或邻近关系。二是图像(icon),对某伟人的塑像或画像致敬,是因为图像符号自然地代表了伟人本人。这两种关系都是“有根据的”(motivated)。绝大部分的符号属第三

类,皮尔斯称做“象征”(symbol),它们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习俗关系(conventionality),无理可讲,相沿成习而已。

语言,是最庞大的几乎“纯习俗”符号。除了一些象声词可以说是带有部分“图像性”(iconicity),其余全靠约定俗成,这就是为什么同一物在各种语言中称呼完全不同的原因。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一直坚持认为中国文字是理想的诗歌语言,因为有直接性;美国新批评派的维姆萨特(William Wimsatt)强调诗歌语言(不一定是中文)是一种“图像语”(iconic language)。这两种说法,从狭义的语言学上说不通,却属于符号学分层解析的二度根据性。

严格说来,“标示”符号与“图像”符号并不是符号学的研究领域:符号学不能解决症状与病因的关系,那是医学的事;符号学不能解决某种植物与某种矿藏的关系,那是地质学的事;符号学也不能解决图像符号与实物关系的问题,例如龙与恐龙或其他动物的关系,那是人类学研究的范围。一般符号学注重研究第三类关系。

而且,前两类符号在实际社会活动中,也必须要有习俗性才能起传达作用。男女盥洗室分别用门上画的穿裙子或穿裤子的人形来标志,如果你完全不知这套符号的约定关系,依然会在厕所门间踟蹰不前。

顺此,索绪尔完全不考虑前两种关系的存在,他认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只可能是任意的(arbitraire,或译“武断的”)。任意性,据他说,是符号学第一原则:符号的能指(例如语词的一定声变或字形)与所指(词的意义)完全不沾边,它们的联系是任意决定的,毫无“根据”(motivation)。

但是,当符号系统形成时,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就不再是任意

的了,相对固定的社会契约保证了能指与所指关系的确定性,从而保证了信息传达的有效性。这称为“透明”(transparency),即能指变得像一层玻璃,使传达直接指向所指,得鱼则可忘筌。当然,这只是理论上如此,实际在符号过程中,所指往往不明晰,成为所谓“内容星云”(content-nebula),也可能能指失去透明性,不引向所指而返回自身。不同符号体系,情况不同。

那么,所指究竟是什么?像皮尔斯那样把所指当做事物,或客体,像索绪尔那样把所指当做理念,或概念,实际上都是超出符号学的范围的,因为所指被视做超符号系统之外的本体。所指应当是系统中的符号的意指对象部分。这话看来像循环理论,但实际上只有如此才能说清符号的特征。

对此,索绪尔似乎有所认识,但他没有作出这样的结论。索绪尔指出一个系统中的能指(例如语音),实际上是声波的连续带(continuum),而所指也是连续带,能指与所指是两爿浑沌,我们分割能指的同时分割所指,因此不仅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连能指与所指的形成也是任意的。

这话似乎有点玄,但实际上不难懂。说汉语的人用“桌子”隔出一个能指区,而说英语的人用“table”和“desk”隔出两个能指区;说汉语的人只有一种老鼠,说英语的人分称为 rat 和 mouse;汉语中有几十种不同的玉,爱斯基摩语有四种不同的雪。使用不同语言符号体系的人,实际上对能指所指的分割都不同。最典型的要算颜色,据专家测定,说不同语言的人心目中的红、黄、蓝等,光谱段都不同。说英语的人搞不懂汉语的“青”或“碧”,他们无此能指,也就无此所指;对说俄语的人来说蓝色有两种,голубой 和 синий;说汉语的人说红酱油、红茶,说英语的人认为是黑的;说汉语的人说白开水、白酒、白纸,说英语的人看不

出何白之有。

因此,所指并不是明确地预先存在,等着能指来意指它们。索绪尔说:“语言是一连串的区别行为,在模糊不确定的概念层与同样模糊不确定的语音层上区分出相应的单位。”^① 索绪尔的话有自我矛盾之处,在所指没有分割出来与能指相配之前,就谈不上是什么所指,“概念”,已经是一种区分,而正如他说的,“语言,正如任何符号系统,其特征是区分一物与组成一物两者没有什么不同”^②。在所指没有在符号系统内被区分出来之前,它无法被组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能把所指定义为系统中符号的意指对象部分的原因。

法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马歇雷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认为文学中符号的所指“并不是‘自然的’经验现象,而是读者作者所居住其中的复杂现实,即他们的观念形态”。

这种所指能指同时分割的现象,结构主义语言学家马丁奈(Henri Martinet)称为“双重分节”(double articulation),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因此巴尔特认为符号学可改名为“分节学”(arthrologie),而符号可改称“节”(articuli)。

信码

上面已经讨论过符号必须依靠系统,才能既任意武断,又传达明确的信息。“√”表示正确,“×”表示错误,是武断的,却是必须尊重的。但是现在常用“×”表示正确,而空格表示不正确。

①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 Wade Baskin, New York, 1959, p. 112.

② R. Godel, *Les Sources manuscrites du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de F. de Saussure*, Droz-Minard, 1957, p. 196.

然而在各自的系统中,“×”究竟是正确还是不正确是不可更易的,不然就乱了套。

而一旦这个系统被社会所接受,就不能随意更改,因为“集体惰性对一切创新必然做出抗拒”^①。赵高用政治权力指鹿为马,只愚弄了皇帝一个人;红卫兵一度人多势众,也没能把红灯改成“通行”的信号。

在这里,符号本身并不重要,鹿完全可以叫做 mǎ。解释符号的规则集合,才是符号系统的生命。不懂球赛规则,比赛让人看来像一堆人在胡闹。“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内行与外行的区别在于内行懂得解释符号的规则。

每个符号系统都有这样一套规则,称为符号系统的信码(code)。使用信码来处理信息,称做编码(encoding)。使用信码来解释符号,就是解码(decoding)。显然,只有编码与解码过程相应,才能“正确地”传达一个信息;不能保证相应,就出现误解。

在实用语言,或实用符号系统中,信码必须是强制式的,误解是绝对的,错了就是错了。编码有绝对权威,解码必须复制编码。在文学艺术这样特殊的符号传达中,解码有一定的自由度,编码没有绝对权威,因此误解就并不是绝对的,通俗地说,就是没有严格的“是非标准”。

语言/言语

从关于信码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符号过程的两个基本层次:一是符号过程的表面进行方式,即信息的传递;另一个是控制符号过程的隐藏的层次。符号过程的最基本特征就是一系

^① Ferdinand de Saussure, op. cit, p. 84.

列的二元化(binairisme)关系。

索绪尔把语言中这种分层关系定名为“语言(langue)/言语(parole)”关系。这是结构主义—符号学最重要、最关键的概念。

Langue,我国当代语言学界译为“语言”,但这与 langage(同样译为“语言”)容易混淆。后者是语言作为一个总体化的存在,例如汉语、法语,都是 langage,而前者 langue,有人译为“语言系统”。索绪尔给 langue 下的定义是“一个仓库……一个文化系统,潜存在每个头脑里,或者,更确切地说,潜存于一群人的头脑里”。因此,译为“语言系统”,容易让人误解为 langage 是不成系统的。我情愿把 langue 译成“潜存语”,但我国语言学界已将 langue 译名统一为“语言”,本书只能从众。

而言语(parole)则是具体的用任何一种物质方式(书面的、口头的)表现的语言行为。语言和言语是同一系统互为表里的两层。语言是社会性的存在,包括词汇、语法、惯用法等个人不能任意改变的资料和规则结合,而言语是个人的选择和实践。没有语言的言语是毫无意义的成串音节,而没有言语的语言就完全不能存在,语言没有物质形式,就像没有肉体的灵魂。

语言/言语之分是索绪尔对语言学做出的划时代的贡献。在这之前,语言学只是一种个体语言学,或者说描述语言学,就像达尔文之前的生物学。

本书不是谈语言学的,因此我们不准在此深入语言学问题。语言/言语二分法是索绪尔为结构主义提出的一个最根本的概念,可以说,承认这个二分法,把这个二分概念用于自己的学科,就成了一个结构主义者。这话说得有简单化之嫌,但实际情况的确如此。

当然,在结构主义中,语言/言语实际上是拿语言学术语做